

# 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

## ——兼论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

陈 南

〔摘 要〕 劳动教育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背景,其既受制于历史的沿革,也为社会条件所制约。劳动教育的思想虽然在晚近时期才得到广泛关注,但在早期的学校教育中已初露端倪,劳动教育的地位也随着中西方不同的演进路线而更迭。考察制约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的社会条件可知:我国早期的劳动教育长期处于以“世袭”“选举”为脉络的“政治社会”中,基本遵循着“混沌—分离—遁隐—重现”的演变历程;西方早期的劳动教育则主要顺应“经济社会”而发展,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的劳动教育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下正式登场,根据社会历史情境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成型期、抵御资本逻辑兴起的式微期和重返全面发展初心的转型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校开展劳动教育不仅需具备历史比较的视野,也要厚植社会支持的土壤,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价值观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劳动教育;思想演变;地位流变;时空背景;教育社会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不仅成为党和国家教育政策方针的重要内容,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不同领域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从纵向上看,新中国劳动教育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将本土教育传统和西方教育理念融会贯通后的产物,有必要拉长视线以考察劳动教育思想的演进。从横向上看,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其实践展开离不开家庭的奠基、学校的主导和社会的支持,社会形态等因素始终制约着劳动教育地位的变迁。因此,回溯“劳动教育”的发展史,需要从整体上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社会基本条件,这构成了学校实施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前提。正如以进化论为基本假定的“新史学”所倡导,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靠个人的苦思冥想,而要关注连同本国制度和社会风俗习惯一起积累和继承的结果。<sup>①</sup>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才显得颇具借鉴意味:世人基于关心当下生活才会观照过去,历史实为现实的精神生活;过去仍“活”在现实之中,历史乃是构成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基

陈南,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97)。本文系省部共建南京师范大学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①[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0页。

②[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页。

于此,尽管仍有必要分析课程、组织、评价等具体内容,但相对宏观地认识劳动教育的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理应成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

## 一、劳动于“政治社会”:中国早期劳动教育思想与地位的演变

自古以来,虽然在家庭和社会中不乏劳动教育的相关思想,但由于劳动教育的主体是学校,传播思想、体现地位的场域在学校,因而本研究主要关注劳动教育的学校层面。另外,早期的劳动教育思想如断线珍珠般散落于历史长河之中,通过梳理特定时空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演变,既有助于在长时段中确立影响条件和机制,也能够反映教育与历史、社会互动的结果。要而言之,从“世袭社会”中劳动教育的初次分离,到“选举社会”中劳动教育的隐而不彰,再到“后选举社会”中劳动教育的重新发现,我国早期劳动教育思想与“政治社会”<sup>①</sup>发展相伴而生,并大体遵循“混沌—分离—遁隐—重现”的演变历程。

### (一) 从混沌到分离:“世袭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远古时期,无论是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言的“蒙昧时代”还是“野蛮时代”,迫于群居和氏族繁衍生息的实际需要,教育与生产生活实为一体<sup>②</sup>:不仅工具制造、采集狩猎等生产劳动离不开经验传授,衣食住行、宗教祭祀等社会活动也少不了能者教导。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门类日益扩大,教育逐渐摆脱生产劳动的“母体”而自成体系,独立的教育机构和脑体的分工开始出现。

我国早期的教育活动主要面向名门贵胄等“社会精英”,传教“国之大事”<sup>③</sup>,这既让教育逐渐远离生产劳动而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也使礼仪和军事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无需赘言的是,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教育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并型构着一个少有流动机会的“世袭社会”。<sup>④</sup> 作为我国最早的学校课程体系,“六艺”充当着培养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统治阶级的文化载体。其中,“礼乐”居于核心,其不仅有助于形成刚柔并济的治国理政方式,也悄然发挥着类似德育和美育的实用功能;同样,以军事训练为基底的“射御”偏向体育,以文化知识为目标的“书数”强调智育,而唯独劳动教育没有被纳入贵族阶级的认识范畴。

春秋时期,随着“士阶层”兴起,与“官学”相对的“私学”得以诞生。其中,儒、墨两家以其鲜明的教育主张和内容成为当时的“显学”。历史上,儒家删订“六经”以突出人文教育,以培养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为己任,将道德实践置于社会实践之上,劳动教育的地位十分有限。《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可充明证: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sup>⑤</sup>此段对话虽争议不断,但的确体现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而且,如果说孔子通过不事农桑、轻视劳动以强调社会分工,那么培养具有“礼义信”等高尚品质的“君子”则是儒家教育的根本方向。

①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形态问题曾有过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不少学者对以经济为核心而划分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中心论颇有疑议,并提出了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另类”分期范式。本文在此基础上权且使用“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两种形态分别解释中国和西方早期的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并无意于忽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而是尝试以“理想类型”的方式突出各自社会的支配因素和关键特征,提供一种观察“教育与社会”的独特视角。可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选举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4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61页。

④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页。

不过,墨家却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墨子及其后学主张“兴利除害”,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作为教育主要内容,虽同样强调德行和思辨,但重视经验和劳动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却显示出与儒家的根本差异。墨家起源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坚韧不拔、苦行役身等劳动精神是墨者身上的“标签”,“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思想也为其传授劳动知识和生产技能提供着支持。<sup>①</sup> 可尽管墨家在生产劳动中“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泽被后世,但学派在战国后期却不再称“显”亦是事实。应该说,这个不同于儒家“人文教育”、以“生产技能教育”为主要内容<sup>②</sup>的独特学派何以兴衰并不是拙文的讨论重点,但它却为考察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初次分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视角。

## (二) 从分离到遁隐:“选举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自秦汉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并充分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理念上。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愈发成熟,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也愈发尖锐,而接受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不仅是广大贫寒士子相对公平的上升途径,也成为统治者笼络社会精英的重要方式。<sup>③</sup> 有学者将这种自上而下地选择治理者,并以竞选者的德性、才能、名望以及文化修养作为选拔依据的等级制社会,称之为“选举社会”。<sup>④</sup> 在如此社会中,无论是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内容,还是社会的学习环境和氛围,都不太能够与“劳动教育”相关联,对此可以从教育内容、人才选拔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予以粗略考察。

第一,学校教育内容脱离劳动。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以后,不管是政府督办的各式官学,还是书院一类的私人讲学场所,无不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并将“仁义礼智信”等规范作为理想人才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学校教育主要面向两类人:一是自身已脱离生产劳动的世子贵胄,读书本身便可视为一种消遣;二是梦想脱离生产劳动的寒门士子,读书兼具改变命运的实用功能。在此导向下,作为政治社会的童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中并未出现“劳动光荣”之类的口号;而闻名遐迩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只是阐述了纲常名教、为学之序、待人处事之要等常规事项;换言之,劳动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第二,人才选拔方式远离劳动。中国旧式教育的特点在于学校与科举相始终,两千年的教育制度史甚至可以被看作为科举制度史。由于获得科举资格后便能享受免除差役、宾礼相待、掌权高升等种种特权,历代士人无不殚精竭力,以科举中榜为荣。同时,科举制度作为重要的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其形式亦随时代而变迁:两汉以家法取士,举孝廉和贤良;唐、宋以诗赋、经义取士,选文采和博闻;明、清以八股取士,择文章和策论。但无论家法、诗经还是八股,都在强调应试者的伦理道德和“纸上功夫”,学校教育难免培养出不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就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其实大多数人无法脱离繁重的生产劳动,故而才会形成“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但筛选未来统治者的科举制度却能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理想化为现实,这也难怪莘莘学子会趋之若鹜。

第三,社会学习风气背离劳动。科举制度确立后,“学优则仕”成为社会主流逻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学习者典型的社会心态。而且,即便罢官或归隐,官员士子也很少直接参与生产劳动,这亦可证实劳动与教育的分离。其中,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创作了不少以劳

<sup>①</sup> 参见《墨子》“非乐”“非命”等章节。

<sup>②</sup> 刘佳、靳贵珍:《试论墨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sup>③</sup> 周勇:《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历史社会学视角》,《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sup>④</sup> 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且属于鲜有的主动向劳动者转换的知识分子,可将其视为代表人物。在《归去来兮辞》中,“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表达出为免于饥寒而违背意愿去做官的懊悔,也反衬着官员的“荣华富贵”;在《桃花源记》中,“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描绘出对朴素劳动生活的向往,也讽刺着官场的“骄奢淫逸”;而在《归园田居》中,对劳动生活的向往终成现实,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却意味着作者对劳动并非热衷,更不用说去领会劳动的真谛。可见,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并未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其对田园生活的讴歌更多是对现实的讽刺。

总之,劳动教育的隐而不彰有其社会文化根源:第一,学校没有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接受教育即意味着“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事劳动;第二,社会逐渐形成“万般皆下品”的风气和氛围,“诗书文章”是人才选拔的标准,因而即便承认学校中有劳动教育的要素,也要认识到其仍主要以脱离生产劳动为旨趣。事实上,在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中,劳动经验知识的传递、劳动德性品格的培养以及中华民族劳动文化的塑造并非以学校为主导,劳动教育更多地需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力量。

### (三) 从遁隐到重现:“后选举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在科举盛行时期,虽然多数士子抱有“读书—做官”的思维定势,但也不能排除部分有识之士对其不以为意。譬如,作为“实学”教育的倡导者,颜习斋反对静坐读书和雍容自得的学习态度,提倡学生做一个吃苦耐劳、节制嗜欲的实行者。对于年龄幼小的,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等仪节;年龄较大的,则学习诗书六艺和兵、农、水、火、钱、谷等实用知识。<sup>①</sup> 可惜的是,尽管颜氏崇尚劳动的教育主张曾大放异彩,但亦如墨家境遇般迅速湮没,无疑更加凸显出“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力量。

旧教育以科举和礼教为主要内容,二者虽有利于巩固贵族精英的统治,却难以助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实学和劳动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显得微不足道。近代社会转型为扭转这一局面提供了契机:其一,以天朝自居、以文明自诩的大国在各项战事和外交中的溃败,动摇了数千年来以“礼”为首的教育根基;其二,商品经济开始超越农业经济,科学技术等实用知识挑战着以“文”为主的八股词章。由此,静坐书房、空疏闲暇的教育不再盛行,而科举制度的衰落则催生出新教育,后者根据西方教育理念对本土教育思想实施了诸多改造。譬如,清政府以“中体西用”为指导颁布的教育宗旨,蔡元培据西方理念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都注重培育既有道德品质,又有生活技能的新式人才。

劳动教育在新教育中备受瞩目。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如何通过文化教育的变革实现“救亡图存”成为不少志士仁人的理想抱负,而获得必需的、先进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以帮助受教育者谋生活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借着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潮,劳动教育开始兴起。根据实用主义原则,民国元年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开设手工、家事、园艺、缝纫、农业等劳动课程,提倡一种倾向于职业养成的劳动教育;而在1932年的《中小学课程标准》中,甚至已设置专门的劳作课以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sup>②</sup> 对此,黄炎培所提及的职业教育的“四大目的”<sup>③</sup>——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也可视为本时期劳动教育的真实写照。

另外,“五四”平民主义思潮在向旧思想和旧制度宣战的同时,也在营造着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氛围。杜威(John Dewey)及其在华弟子作为民主教育的推崇者,大力宣传“使学校生活成为社会生活,民众求学即是求生活”的教育原理,意在使个人对社会的经济关系、民主管理、共同生活等情境

<sup>①</sup>李国钧:《颜元教育思想简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sup>②</sup>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587—678页。

<sup>③</sup>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4期。

产生直接兴趣以改造传统社会。<sup>①</sup> 事实表明,在不再宣扬血统和等级的“后选举社会”中——史学界常以“两半社会”冠名,<sup>②</sup>学校教育的普及化、生活化让“瓮牖绳枢之子”和“引车卖浆之徒”获得了宝贵的受教育机会,这既激发出劳动人民的奋斗热情和“主人翁”精神,也使劳动教育思想在学校中真正萌发并占据重要地位。至此,我国劳动教育的思想表达和话语实践终于在社会转型、历史发展以及学校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姗姗来迟,虽仍然显得有些“犹抱琵琶”,但也为后来新中国劳动教育发展奠定了有益基础。

## 二、劳动在“经济社会”:西方早期劳动教育思想与地位的变迁

与我国传统社会以政治为核心不同,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视经济因素,早期劳动教育的演变也主要受到强调身心关系和生产力要素的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根据经济社会形态,西方劳动教育大致经历着从奴隶社会中教育与劳动基本分离,过渡到封建社会中教育与劳动有限联结,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教育与劳动紧密结合的变迁过程;期间,劳动教育不仅承担着神圣的宗教义务,更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并深深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

### (一) 教育与劳动基本分离:奴隶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教育活动亦被视为西方教育之源头。有学者认为,古代希腊教育的发展与其奴隶社会的发展历程基本一致,理解这一内容需要从考察希腊城邦开始;而在众多城邦中,斯巴达和雅典无疑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个案”。<sup>③</sup> 根据已有研究,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特色十分鲜明:前者推崇尚武的军事教育,致力于培养身体健壮的“野性之人”(Beast-like),“或得桂冠,或舍生命”是斯巴达人参加运动会的响亮口号;而后者主要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它的培养目标“不是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却是要年轻人讨厌商人和市场”,以致在后期形成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论。<sup>④</sup>

古希腊教育在内容和活动中甚少涉及劳动教育范畴,其缘由似乎可从“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虽学说各异却继往开来的教育思想中寻觅。在奴隶制经济占主导的古希腊社会,社会分工思想和商品价值理论逐步形成,培养统治者的德性和理性已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反,以身体为基础的生产劳动由于专属于平民和奴隶,则被完全排除在学园之外。<sup>⑤</sup> 在他们看来,身体的本质是欲望和激情,而灵魂则代表智慧和理性,灵魂在高于肉体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教育来促进灵魂的转向。在著名的“洞穴隐喻”中,囚徒们的灵魂为身体所束缚,这使得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相互隔离,而挣脱锁链走向阳光正象征着一个灵魂转向的过程。<sup>⑥</sup>

自柏拉图开始,“身体”被视为控制和节制的对象,“劳动”也开始成为被统治阶级的专属活动。在《斐多篇》中,“身体”被描述为近似于人类的各种“欲望”和“享乐行为”,故理想的人并不关心他的身体,“灵魂要摆脱与身体的联系”更具有一些伦理味道。同样地,在与上帝创世思想渊源较深的《蒂迈欧篇》中,身心之别表现得更为直接:第一,灵魂先于身体被创造;第二,灵魂由创造主直接构造而

①[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旭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9页。

②何怀宏:《不仅是科举,不仅是教育制度》,2010年5月20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801.html>。

③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31页。

④李立国:《古代希腊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3页。

⑤吴奎罡:《新编西方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13页。

⑥[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5—281页。

成,身体则是创造主创造的“诸神”的作品,人的本质不是身体而是灵魂。<sup>①</sup>因此,相对于灵魂的高洁和永恒,终将归于尘土的身体难以获得应有重视,劳动教育在最初阶段缺少思想生长的土壤,从一开始就被放置在极其边缘的位置。

正是在这身心分离的世界里,思想家们认为,纯技术的知识卑贱于纯理论的知识,而知识的理论价值也高于其实用价值。在奴隶社会中,“人”与“奴隶”相对立,“人”的规定性围绕“自由”而展开,尤其强调拥有足够的闲暇而不必为生计奔波劳动而束缚身体、损害心灵。在谈及自由教育产生的条件时,亚氏说道:“任何职业、技术和研究倘使得自由人的身体或思想不适合于德性的运用和实行,都应认为是工匠的活动。因此,凡是那些准备来使文明的身体败坏的技艺以及领取酬金的活计我们都称为工匠的,因为它使我们的思想劳碌而卑劣。”<sup>②</sup>所以,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闲暇”(希腊语为“skhole”),而这也是西方“school”(学校)一词的起源。因此,学校教育是为了获得闲暇的思想印证着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传统,也意味着学校劳动教育只能让位于对理性的求索。

## (二) 教育与劳动有限联结:封建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除了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也是西方文明的组成核心。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教会作为封建主在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此时,学校教育带有显著的教会特征,内容多继承古罗马晚期的“七个自由学科”,而教育的主要目标也在于理解《圣经》和掌握牧灵所需要的知识。<sup>③</sup>在内涵丰富的基督教义中,有不少涉及劳动的内容和观点,并以此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劳动教育,譬如在《旧约·创世纪》中,神造物的工作在第七日得以完毕,并将其定为“安息日”,这或可看成劳动间歇中的“法定”休息日;另外,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神将“终身劳苦才得糊口”作为对人类的惩罚,这似乎也在肯定劳动所具有的禁欲主义精神。<sup>④</sup>

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的宗教阐释,灵魂和身体之对立已成为基督教的基本要义,而作为集大成者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更进一步,将“灵魂不灭,身体可朽”这一神学中的基本教条,转变成哲学上的必然命题。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将灵魂视为不包含质料的纯粹形式,身体的腐朽是源于形式与之分离;又将灵魂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性的、感官性的,依靠身体的能力,另一类是理性的、智性的,不依靠身体的能力。如此,理智不仅成为灵魂中的最高能力而统领其他,也让身体和灵魂有着结合的可能和“天性”,世俗的活动虽是肉体的事情,其意志却是由上帝支配的。<sup>⑤</sup>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深刻影响着中世纪的大学教育,神学、文学、法学、医学的学院设置在维护封建统治和教会权威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和身体实践的重要性。<sup>⑥</sup>而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那里,身心对立变得更加尖锐,甚至依照着一种清晰的权力划分将灵魂分配给教会,把身体安排给科学,二者之间不再具有什么重要的互动。<sup>⑦</sup>他不仅彻底否定了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联,而且借助“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将理性、自我凌驾于肉体之上,使“身一心二元论”成为思想之定律。

之所以颇费笔墨地梳理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史,其实是为了考察宗教改革过程中“身体—劳动”和“灵魂—劳动价值”这对概念所可能折射出的西方劳动教育传统。毕竟,身体是劳动的基本载体,灵魂则象征着劳动之价值和精神,劳动作为特殊的尘世活动充当着联结身体和灵魂的中介。对此,我

①范譔:《消解与重构——西方社会理论中的身体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2—37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8页。

③[德]毕尔麦尔等:《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64—66页。

④参见《旧约·创世纪》二章1—3节、三章17—19节。

⑤[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6卷),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4—94页。

⑥欧阳军喜、王宪明:《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57—66页。

⑦A. Synnott,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23.

们可以援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加以阐释,该书旨在考察宗教利益和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如何能够合二为一。韦伯认为,新教教义中的物质主义和世俗化不同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看待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但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对劳动道德中立的天主教所采取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再为上帝所认可,而新教教义所强调的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赋予他的劳动义务则成为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行为谏言”。因此,追求灵魂的救赎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要求人们必须将劳动本身视为目的,甚至当做一种“天职”(calling)去履行;同时,这种对待劳动的态度并非与生俱来,也无法凭借工资来唤醒,而只能是辛勤教育的产物。<sup>①</sup>

毋庸讳言,教师行会对学校教育主导权的制衡究竟如何影响劳动观念,经济取向的市民劳动怎样区别于古代城邦的奴隶劳动,以及劳动教育发展与基督教哲学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这些问题的答案仍需要去探寻;但就依靠身体之劳动以获得灵魂之救赎来说,的确也能体现出封建社会时期劳动教育的惯例和传统。在宗教改革与经济增长相耦合的时空中,劳动教育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而随着工业革命爆发和经济社会成型,劳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 (三) 教育与劳动紧密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中的劳动教育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不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却能够实现“炫耀式休闲”和“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sup>②</sup>转变为各领域“致命的诱惑”,对劳动的哲学探索也开始具体化为一种政治经济学规定。其中,马克思(Karl H. Marx)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极具代表性,即:劳动可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后者则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sup>③</sup>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劳动创造价值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原始逻辑,而劳动在成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同时,自身也开始逐渐异化。<sup>④</sup>

这种“异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变迁为背景,而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也使身体有用性成为管理者关注的核心和主题。对此,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见解同样发人深省: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和劳动产品分离,那么也可以说,规训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限定联系;当惩罚从制造残酷图景的身体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劳动力便不再隶属于君主,而是社会的财产和集体占用的对象,因此改革者几乎总是主张将公益劳动作为有效惩罚手段。<sup>⑤</sup>福柯的观点在历史上已有印证,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前甚至冠冕堂皇地竖立着“劳动使人自由”的惊人标语<sup>⑥</sup>,似在以此告诫劳动改造者救赎自我的手段和途径。

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社会创造的堪称伟大的经济奇迹,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断培育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土壤:第一,与中世纪教育不同,教育机构逐渐摆脱宗教的控制而呈现独立化,“宗教的观点”已降格为诸多教育话语中的一种,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的实用教育呼之欲出;<sup>⑦</sup>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要求颇高,但由于后者无法被劳动者直接掌握,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将其引入工业生产,而“现代教育和现代生产劳动这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为结合点的这种

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83页。

②[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5—80页。

③[德]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④胡君进、檀传宝:《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经典文献的研析》,《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⑤[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23—156页。

⑥[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34—150页。

⑦郑崧:《国家、教会与学校教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9—13页。

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状态,就叫做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sup>①</sup>。

对于上述过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有涉及,尤其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已成为后世推崇“教劳结合”的思想典范。他曾寄语理想中的教育:“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sup>②</sup>当然,“教劳结合”以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为背景和语境,这里的“劳动”主要指工作和生产意义上的劳动,而非“学校劳动”或“家务劳动”。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对劳动的重视依然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尤其是在制度规范、课程设置等方面形成了关心劳动、鼓励劳动的传统,这些经验固然带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却也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劳动教育带来不少启发。

### 三、思想融合与地位浮沉:新中国劳动教育的发展之路

从时空角度来看,劳动教育思想具有颇为悠久的历史渊源,劳动教育在学校和社会中的地位也随着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侧重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历史表明,劳动教育作为日常概念或学术概念而得到本土社会的真正重视,需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此之前,尽管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提出过类似口号,甚至学校中已出现些许劳动实践,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未能形成普遍的社会回应,“劳动教育”的概念也迟迟没有得到认可。<sup>③</sup>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教育事业得到大力发展,“教劳结合”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也彰显出自身的政治经济学属性。根据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可以概要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劳动教育的成型期、劳动教育的式微期和劳动教育的转型期。

#### (一) 国家建设的需要:劳动教育逐渐成型

历史上,无论在阶级社会中,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总是受到歧视和压迫,而劳心者却往往居于“人上人”的地位。在共和国的奠基时期,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与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剥削阶级垄断的“旧教育”相揖别的决心和行动,也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由此,劳动、劳动人民、劳动教育成为“关键词”,学校教育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治任务,也要求学生在身体上、知识上和思想上做好准备,劳动教育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正如吴玉章所言,劳动教育应贯穿教育全过程,学校既要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品质,又要给予学生从事生产劳动的知识文化,使其成为热爱劳动、善于劳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sup>④</sup>可以说,对待劳动的态度已成为区分新社会与旧社会、辨别新道德与旧道德的重要标准。

为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党和政府采取“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短短五年时间,已实现全国小学生中工农成分占80%以上,中学生中工农成分占60%以上。<sup>⑤</sup>然而随着工农成分的大幅增加,学校中却逐渐弥漫出“求升学”“当干部”的“资产阶级风气”。不难理解,工农子弟由于在旧社会中缺少教育机会,“不情愿地”背负着“文盲”的包袱;而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他们自然

①成有信:《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②[德]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0页。

③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④吴玉章:《给全国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4年5月3日,第2版。

⑤程万里等:《劳动教育诸问题》,武汉: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4年,第23—24页。



想通过教育来摆脱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继而出现“种地没出息”“做工没前途”的思想。对此,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尽可能满足中小学生的升学需求,另一方面,充分联系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引导未升学的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在国家建设的硬任务下,多数中小学毕业生需直接参加劳动生产,因而当时主流的教育论述、讲话和研讨都指向劳动教育,并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同时,作为经验学习的样板,苏联教育中的劳动成分被合理借鉴,马克思、列宁、加里宁等共产主义者的劳动教育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并指导着国内大中小学的劳动实践。作为战后重建的主要任务,通过教育培养大批专门人才成为恢复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学校亦开始重视教学与生活相脱节的问题。<sup>①</sup>针对学校课程学术性高于实用性、升学性先于就业性的痼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把“勤工俭学”作为教劳结合的手段,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劳动教育逐渐成型且一时风光无两。<sup>②</sup>劳动教育的诸多举措贯彻着“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意在铲除残余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过,对传统教育的大破大立在“文革”期间走向极端,劳动教育在成型发展之际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 （二）资本逻辑的兴起:劳动教育趋于式微

改革开放为劳动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背景,尤其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更丰富着劳动教育的内涵与意义。<sup>③</sup>新时期,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推动着教育的现代转型,劳动教育的社会功能开始从集体主义转向兼顾个性发展,学生的个体需要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劳动教育逐渐与政治意涵较少、经济意味较浓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甚至一度出现了为后者所取代的趋势,劳动教育在“五育”中亦处于富有争议的地位<sup>④</sup>。对此,有学者认为,劳动教育的实用主义化使其削弱了思想性,忽视了人文性,淡化了教育性,在学校改革过程中其课程地位不断降低,在以升学就业为导向的应试氛围中更是难以占据重要位置。<sup>⑤</sup>“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已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sup>⑥</sup>

劳动教育的式微主要源自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的偏差。在施托伯格(R. Stollbery)看来,人的劳动态度既是对社会态度的反映,也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反映;<sup>⑦</sup>因此,考察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教育观需结合社会历史情境。在现代社会,劳动逐渐涵盖人类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甚至可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实体劳动与虚拟劳动、艺术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等等,都看成劳动。<sup>⑧</sup>相应地,劳动教育也可表现为生活生产劳动、职业体验劳动和设计制作等创造性劳动形态。<sup>⑨</sup>基于此,尽管劳动在本质上没有贵贱之分,但随着劳动内涵的丰富和劳动形式的更新,学生群体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少劳”甚至“不劳”的职业或工作,普遍向往“高大上”的工作环境和自由闲散的工作时间,这不仅助长着青少年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风,也使学校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眼高手低”的

①《外国教育丛书》编辑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1—27页。

②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江苏教育》1958年第18期。

③张雨强、张书宁:《新中国成立70年劳动教育的历史演变——基于教育政策学的视角》,《中国教育学报》2019年第10期。

④瞿葆奎:《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⑤徐长发:《新时代劳动教育再发展的逻辑》,《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

⑥教育部等:《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5年7月24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507/t20150731\\_19706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507/t20150731_197068.html)。

⑦[德]鲁·施托伯格:《劳动社会学》,袁伦渠、李步魁译,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⑧曾天山:《我国劳动教育的前世今生》,《人民政协报》2019年5月8日,第10版。

⑨顾建军、毕文健:《刍议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的一体化设计》,《人民教育》2019年第10期。

现象。<sup>①</sup>

事实上,应试教育以学业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顽疾让劳动教育为学校和家庭所忽视,对个人利益和资本利润的盲目追逐使“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社会价值观念出现扭曲,这些现象正从不同方面指向着“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个体不断提高经济资本、增加文化资本、激活社会资本的“竞赛”时空中发生异化变形,甚至变相地成为鼓励“加班加点”和“身体压榨”的职场文化。资本逻辑的兴起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副产物”,它一方面制约着学校劳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探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教育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 (三)全面发展的初心:劳动教育转型回归

综观历史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劳动教育大体表现为“政治挂帅”,改革开放后的劳动教育主要体现出“经济引领”,而将劳动教育自身视为独立目标以至于实现“教育主导”的呼吁,却长期没有成为现实,人的全面发展的初心也几近被忘却。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赋予劳动教育以满足社会需要和人的需要这一双重任务,党和政府更是陆续出台一系列推进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使其重新回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之中,劳动教育的转型回归之路已经开启。劳动教育建立在劳动满足需要的基础之上,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命题,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劳动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劳动创造了手、产生了语言 and 意识、促进了整个机体的变化;不仅教育起源于劳动,人类也是在劳动中“诞生”的。<sup>②</sup>换言之,人可以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并完成社会化的任务。

当然,考察劳动需要的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劳动动机,二者的对应关系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回顾劳动教育的变迁历程可知,在基督教哲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劳动是为了获得神的救赎;在古代阶级社会或者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劳动才可能真正成为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劳动教育才可能真正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把握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体系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进行批判时说道,“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由于劳动并未成为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因而他越是辛勤劳动,就越可能会放弃生产的乐趣以及对劳动产品的享受,这更“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sup>③</sup>可见,劳动者是享受劳动服务和产品的对象,对劳动实践的需要必须冲破工具价值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和教育观也意在强调人能够通过自由的劳动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sup>④</sup>

但在强调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高控制性的“麦当劳化社会”,劳动工序逐渐程式化,劳动者失去自由选择的余地,并如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sup>⑤</sup>有学者据此认为全世界正进入以资本为导向的“过劳时代”,并将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和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作为催生

①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页。

③[德]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60页。

④程从柱:《劳动教育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人的发展观的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⑤[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6—20页。

“过劳时代”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sup>①</sup>可以预料,技术革命将不断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或许会改变劳动的形态,但难以改变充满竞争性的消费社会对劳动者身体和精神的侵蚀。因此,当前和未来的劳动教育在利用校内劳作、校外实践等课程以成就学习者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同时,也应充当联结家庭和社会的“沟通桥梁”,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理性认识劳动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价值观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蒋永华)

##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and Positional Changes in Labor Education: The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of Developing Labor Education**

CHEN Nan

**Abstract:**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though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pecific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which is not only subject 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ut also restricted by social conditions. Although the thoughts related to labor education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recent period, they have already begun to emerge in the school for long time, and the status of labor education has also changed along different evolutionary rout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By examin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 that restrict the evolution of labor educ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 early labor education in China was carried out in a ‘political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hereditary’ and ‘election’ for ages and has followed an evolutionary path “from chaos to separation to disappearance to re-emergence”; while the early western labor education was mainly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an ‘economic society’ in which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capitalist spir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Labor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1949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haping period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decline period of resisting the rise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idea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needs not only to embrace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but also to strengthen the atmosphere of social support and establish the correct view on labor and values to serv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labor education; ideological evolution; positional change; spatiotemporal backgrou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bout the author:** CHEN Na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

---

①[日]森冈孝二:《过劳时代》,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20—88页。